

DONG BEI

张毓茂 著

东北新文学论丛

LUN CONG

XIN WEN XUE

沈阳出版社

责任编辑 王守勋
装帧设计 冯守哲
责任校对 刘捷

东北新文学论丛

张毓茂 著

沈阳出版社出版

(沈阳市和平区十三纬路2段19号)

辽宁省新华书店发行

丹东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字数 219000

印张 8.625 印数 1—3,000

1989年3月第1版 1989年3月第1次印刷

ISBN 7-80556-152-9/I·66 定价: 3.00元

序

王向峰

我有一个习惯：凡是朋友的诗文论著出版发表了，如能遇到文本，好象是有一种促动力，因此，我总是放在优先阅读之列，即使时间紧迫，也要翻翻，看看；友其人，而又读其文，这样就如同在一起渡了一次心。对于毓茂的文章当然更不例外。收入本书的23篇文章，当年单篇发表时我就基本读过了。这次辑印成书，为了获得总体印象，我又一次地翻读了文稿。现在我来说：毓茂在东北新文学的研究上已经下了很大的功夫，取得了显著的成就。

从三十年代以来，东北这块土地上事变迭出，生活动荡，形成了一个特有的文化带。在这段不长不短的历史过程中，当处在生死场中的东北民众有力呻吟、无眠呼喊之际，象涌现奇迹一样，这里忽然出现了不少年轻作家，他们感应人民情绪，写出了这里的血泪与抗争。他们之中的佼佼者萧军和萧红，另外还有罗烽、舒群、马加、白朗、山丁等等，也都各自显示了自己的特色。对于这一段必须给予历史地位的东北文学史，现在国内的研究者尚涉笔甚少。毓茂多年来为此一边奔走号召，一边实际研究，写出了《要填补现代文学研究中的空白》这样带有总体设计意义的论文，又对萧军、萧红的作家性格、作品特点，进行了深入研究，写出了很有学术价值的《萧军论》、《萧红论》，以及对他们许多名篇的全面评论。这些工作，不仅对东北新文学的深入研究具有开拓意义，对于现代文学史的研究也具有深化和促进的意义。

深入全面地开展对于东北新文学的研究，有不少障碍需要扫除。毓茂这本书就是扫除障碍的先行之作。人所共知，不少东北作家在许多年中的政治遭遇都不太好，深受极左路线之苦，有的被扣上“汉奸”帽子，有的被戴上“反党”帽子，有的被加上“右派”帽子。本书中的许多文章都在对这些历史乖误进行正本清源，把历史还给了历史。论者的态度极其明确，显示了评论家所应具有的原则立场。我想这也是许多东北作家对毓茂同志特别赞赏和重视的一个原因。

毓茂的这本著作对作品的研究做得非常深入细致。书中的题目有三分之二以上是用在对作品的文本分析之上的。这些文章首先重在解读作品的本义，同时也从期待视野的最佳点上加以生发、推衍，最后达到欣赏外化的文字肯定。书中对《八月的乡村》、《吴越春秋史话》、《小城三月》、《初冬》的评论、分析、鉴赏都是非常精彩的。读者沿着鉴赏者的思路，是在读着萧军、萧红作品，但同时会感到，若没有这样一个引导人，自己即使能看出一些问题，也未必能够想得那么多，说得那么好。所以，这本书除了有益专门研究者，也有益于许多想要在看完作品后也评论作品的人，会给他们以如何从鉴赏角度评论作品的许多启发。

毓茂日常为人做事，求真求实，在对本书所涉的问题、人物、作品的评价上，也是一如其人。他对萧军写的早已被人歪曲得面目全非的作品，象一个考古学家面对刚出土的珍贵文物一样，先是清理现场，然后挖掘、收拢残片，再除去泥垢，辨认实体，最后再做出本来意义的解释。情诚之心，令人感动。他对李克异、边玲玲的小说的评价，也是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给了应有的肯定。对于宁勋的几本诗集的总评，不仅给作者以足够的成绩肯定，也帮助读者提高了鉴赏水平。对于

张笑天的创作的评论，分析得全面深入，不论对作者本人还是其他人，都很有启发意义。这些为多方所需的评论，自然是很为有利于文艺发展的。

毓茂是我一起共事多年的好友，我们在同时代建构了自己的知识体系与文化心理，性格上也有许多相同之处；过去每当评时论世、臧否人物，常是看法一致，是非同步。今天他又有新著出版，我非常为之高兴。他在本书的后记中说到了“突破和超越自我”的问题，这也表明了自我的自我意识，我相信他比我更有未老的开拓力，本书的出版就是开始。

1988年12月23日雪天

于辽宁大学

目 录

序.....	王向峰
要填补现代文学研究中的空白.....	1
——以沦陷时期的东北文学为例	
“文化报事件”始末与教训.....	7
评《长夜萤火》.....	23
《绿色的谷》初探.....	34
《网和地和鱼》的遭遇.....	47
鲁迅与萧军.....	56
两个勇敢的跋涉者.....	61
——论萧军与萧红	
萧军论.....	78
萧红论.....	107
“不愿做奴隶的人们”.....	124
——评萧军的长篇小说《八月的乡村》	
“千秋功罪知无舛”.....	134
——重评萧军的《五月的矿山》	
“雄浑、沉毅、庄严的史诗”.....	145
——评萧军的长篇小说《第三代》	
敢为人民写春秋.....	159
——论萧军的《吴越春秋史话》	
揭示灵魂的艺术.....	176

——再论萧军的《吴越春秋史话》	
觉醒者的哀歌·····	190
——评萧红的《小城三月》	
黎明前的风暴·····	198
——评萧红的《夜风》	
盈盈一水间·····	205
——评萧红的《桥》	
“说不出的痛苦最痛苦”·····	211
——评萧红的《初冬》	
梦绕故园寄深情·····	216
——评萧红的《失眠之夜》	
我看守勋的诗·····	221
试论张笑天创作的思想倾向·····	229
爱与美的追求者·····	247
——评边玲玲的小说创作	
美，并没有失落·····	262
——读中篇小说《圣水》随想	
后 记·····	267

要填补现代文学研究中的空白

——以沦陷时期的东北文学为例

现代文学研究是一门年轻的学科，它的许多方面的问题，没有或很少有人触及，亟需扩大研究领域，增加研究课题。比如沦陷时期的东北地区（即伪满洲国）文学，目前所有的现代文学史书籍中都丝毫不曾提及，也很少有人公开发表过这方面的研究文章，至今仍是一片空白。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固然很多，但主要是由于“左倾”思潮的干扰和破坏。早在建国前夕，就发生了对萧军及《文化报》问题的错误处分，由此祸及了一批东北沦陷时期的进步作家。同时，对这些作家到解放区后写的作品，采取歧视和排斥的态度，明显的例子，就是对李克异（袁犀）同志《网和地和鱼》的粗暴批评。到五十年代中期，在反右斗争扩大化中，沦陷时期的绝大多数作家都受到了批判，不加分析和区别地统统扣上“右派分子”、“伪满作家”、“汉奸文人”等政治帽子，他们的作品被斥为“汉奸文艺”，一律列为禁书，打入冷宫。在这样的政治气氛下，人们对沦陷时期的东北文学除了作为“汉奸文艺”而肆意挞伐外，是根本不可能进行什么研究的。至于“四人帮”十年肆虐期间，沦陷时期的作家就无一幸免地受尽残酷迫害，许多人因而冤死狱中……今天他们都在党的关怀下，平反昭雪，恢复名誉，然而幸存者已经寥寥无几了。

实际上，在沦陷时期的东北，尽管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

拚命鼓吹和扶植封建法西斯文学，但在党的领导和影响下，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小资产阶级的爱国抗日文学，始终存在着，斗争着，发展着！早在五四时期，新文学运动就波及到了东北。当时在吉林有白杨社，在沈阳有启明学会等文学社团，分别出版了《白杨》和《启明旬刊》等文学刊物，在读者中产生过比较广泛的影响。二十年代后期，在中共满洲省委的关怀和指导下，左翼革命文艺运动开始发展。据不完全统计，1928—1930年间，仅在沈阳一地陆续出版的文学刊物，便有十五种之多。其中如《关外》、《冰花》、《辽风》、《劲草》等刊物，都曾大力宣传新兴的无产阶级文学和以爱国为宗旨的民族主义文学。“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东北，东北人民开始了十四年的亡国奴的悲惨生活。在这漫长的黑暗年代里，党的和非党的革命文艺家，同东北广大人民一起，与日本帝国主义展开浴血搏斗。他们不但用笔，而且用刀枪奋战，许多人为此献出了宝贵的生命。当时以哈尔滨为活动中心的革命作家有巴来（金剑啸）、洛虹（罗烽）、黑人（舒群）、姜椿芳、刘莉（白朗）、三郎（萧军）、悄吟（萧红）、山丁（邓立）、金人、陈隄等。他们以《夜哨》、《文艺》、《芜田》等刊物为阵地，发表了一系列具有战斗倾向的作品，向敌人勇猛冲击。如剑啸的长诗《兴安岭的风雪》、小说《星期天》；萧军的《烛心》、《孤雏》；萧红的《夜风》、《看风筝》、《麦场》（即后来轰动上海文坛的《生死场》中的一章）；罗烽的《口供》、《两个阵营的对峙》等等。他们当中许多人（如萧军、萧红、罗烽等）后来撤入关内，同上海左翼文艺队伍汇合，形成了三十年代崛起于上海文坛的“东北作家群”。而留在沦陷区的作家们，则在敌人血腥统治下继续以文艺为武器进行反帝爱国的斗争。尽管史料已严重散失，但据仅

存的残缺资料，仍可看到他们活动的成绩。比如1933年一年之内的文学社团就有十七个。其中冷雾社、飘零社、新社和白光社都非常活跃，出版《冷雾》、《飘零》、《罗丝》、《白光》等刊物。此后虽然斗争日益艰苦，但战斗在沦陷区的作家们仍然以各种方式从事反帝爱国的文艺活动。在当时的《凤凰》、《新青年》、《明明》、《文丛》、《作风》等刊物上发表了大量进步作品。这时期著名的作家有山丁、袁犀、秋萤、金音、小松、但娣、梅娘等。比较优秀的作品如长篇小说《绿色的豆》（山丁）、《河流的底层》（秋萤）、短篇小说集《泥沼》（袁犀）、《小工车》（秋萤）、《山风》（山丁）、《第二代》（梅娘）等。他们当中某些人在激烈斗争中，虽然也曾消沉、落伍，但就总体来说，始终是在不断前进的。当然，由于特殊历史条件的局限，他们提出的文艺口号（如“乡土文学”）也许不够明确尖锐，他们作品的情调有时不免伤感悲观……总之，他们同以上海为中心的左翼文艺运动相比较，确是显得幼稚、薄弱一些，有着这样那样的失误。然而，不管怎么说，那是暗夜里的灯火，沉寂中的呐喊，显示着“五四”以来的新文学的大潮在沦陷时期的东北并未中断，即使化为潜流吧，它也是在滚动着，前进着，呼啸着！最近，一位沦陷时期的老作家回顾说：“当然，十四年的沦陷并没有产生过光耀文史的金元杂剧和清朝一代的古典名作，也没有出现过关汉卿、曹雪芹那样伟大的作家。但从这一时期的作品看，却继承了“五四”以来祖国文学革命的优良传统，绝大部分都能从现实出发，有明确的爱憎，比较接近劳苦大众。对被奴役受迫害者有强烈的同情。因而敢和敌人站在对立面，反映了这一时期在沉重民族灾难里，人民生活的痛苦和悲惨，为我们展现出当时统治者宣扬为‘王道乐土’的真实图景。从另一角度出发，对英

勇杀敌的抗战英雄，也有过热情洋溢的歌颂。”“可以肯定，这一时期的文学，就其主流或总的航向看，基本是健康的，是倾向革命的。”不消说，这不是定论，但对现代文学的研究无疑是有启发的。它提醒我们注意：在那么一大片国土（东北）上，在那么漫长的时期（十四年）里，曾经有过珍贵的文学遗产！我们怎能置之不问呢？难道不应该集中精力尽快发掘出来以丰富我们的文学宝库吗？

为此，我们是有许多工作要做的。

首先，必须彻底从“左倾”错误的禁锢中解放出来，重新评价沦陷时期的东北文学，还历史以本来面目。长期以来，在“左倾”错误思想的干扰下，给人们造成一种印象，似乎只要是在敌伪统治时期发表的作品，就一律是“伪满文学”、“汉奸文艺”；作者呢，也就自然是“汉奸文人”、“伪满作家”。这是一种极端荒唐的逻辑。正如萧军同志指出的，照这种逻辑推论，在国民党统治下发表作品的作家岂不就都是国民党作家？那么一来，就连鲁迅先生也难逃“国民党作家”的恶谥了。正是在这样“左”的思潮下，沦陷时期的进步文学流派（如“文丛派”），进步的文学口号（如“乡土文学”），以及《山丁花》（疑迟）、《绿色的谷》（山丁）、《河流的底层》（秋萤）、《安荻和马华》（但娣）等一批较优秀的作品都被作为“汉奸文艺”而一笔抹煞了。而象山丁、秋萤、袁犀等沦陷时期的进步作家的不幸遭遇，也是令人十分痛心的。至于思想倾向比较复杂的作家（如爵青等）和他们的作品，就更得不到细致的分析和准确的评价了。今天，在十年动乱后侥幸活下来的沦陷时期的东北作家重新执笔写作，特别是李克异（袁犀）同志，不但写出电影剧本《归心似箭》、《杨靖宇》，而且以惊人的毅力撰写长篇巨作《历史的回声》，竟至呕心沥

血葬死于案前。然而，毋庸讳言，“左倾”错误影响仍然不同程度地束缚着他们。他们虽然在政治上平了反，但有些人在创作和学术活动方面仍然得不到应有的尊重，仍然由于各种原因而背着沉重的思想包袱。只有彻底纠正“左倾”错误，才有可能彻底解放思想，通过对这段文学深入细致的研究工作，作出新的评价。

其次，应该集中力量尽快搜集、整理东北沦陷时期的文学资料。这包括三方面的工作：一，整理、编写主要文艺刊物的文章目录索引。这些刊物散失很多，残存部分又分藏在不同的图书馆中，借阅极为困难，如无详尽索引，简直如大海捞针。对其中重要的刊物和篇章，还要做必要的复印；二，有影响的进步作家，如山丁、袁犀、秋萤、金音、但娣、成弦、梅娘等人的作品是应该重新出版的，或出文集，或出选集，或重印代表作，以便让读者重睹“暗夜弥天中的异彩”，再聆“岩石重压下的强音”（秋萤语）；三，组织今天还健在的作家写文学回忆录。他们可能分属不同的文学流派，具有不同的政治倾向，但他们提供的史料都会有一定的学术价值。这些作家大多年事已高，或则体弱多病，记忆衰退；或则由于其它种种原因，难免有忘却、误记之处，不同史料之间可以互相补充，彼此纠正，使资料臻于准确完备。可是这方面工作困难很大，有的老作家抱病执笔，但撰写出的回忆史料却很难发表或出版。辽宁和黑龙江两省的文学研究所合出的内部刊物《东北现代文学史料》，在这方面作了有益的工作但由于经费的拮据和印刷周期太长，还远远不能适应研究工作的需要。这方面的问题如不能尽快解决，沦陷时期东北文学的研究工作是很难有重大突破的。

其三，现在有的研究单位和大专院校中文系协作，着手编

写《东北现代文学史》，这无疑是一项重大的开拓性的研究工作。然而，应该看到，对文学发展规律的认识是需要一个沉淀过程的，这个沉淀过程，就是分析、研究文学现象的过程。把握沦陷时期东北文学的发展规律，不仅要对一些个别作家作品的政治观点、社会思想、美学观点、创作倾向、艺术风格进行细致的分析，而且在总体上，要密切地、宽广地与东北沦陷时期的社会历史条件，从社会到文艺的各种思潮联系起来分析，才能确切地、全面地反映出这段文学发展的线索、过程和面貌，探索出内在的规律和因果关系，总结出成就和不足、经验和教训。为此，必须展开百家争鸣，深入探讨，积累比较充实的研究成果，在总结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才有可能编写出一部比较坚实的文学史。可是，到现在为止，这方面的研究成果几乎没有。比如沦陷时期东北文学与中国古典文学和五四新文学的关系？它的主体与中原地区文学的主体从基本性质和基本倾向来看有什么异同？东北沦陷时期“乡土文学”的特色以及现实主义文学的浮沉等等，都应该深入探讨和充分研究，否则仓促编写，急就成书，很容易流于一个个作家作品评论的罗列和堆积，缺少整体感，是很难达到应有的理论深度的。

仅从沦陷时期的东北文学一个例子来看，就可以看到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还有多少空白需要我们去填补。在谈到开创这门学科的新局面时，不要再忽略了这个重要的方面。

“文化报事件”始末与教训

三十八年前，当解放战争胜利进行、新的人民共和国即将诞生时，在东北解放区哈尔滨的文化界，发生了一场悲剧——“《文化报》事件”。从1948年秋到1949年春，差不多半年的时间里，萧军主编的《文化报》和宋之的等人创办的《生活报》展开激烈的论战。结果，以中共中央东北局的名义作出《关于萧军问题的决定》。萧军被加上反苏、反共、反人民的罪名，《文化报》被勒令停刊。当时，东北解放区许多报刊和各机关的壁报、墙报、黑板报，都开展了批判萧军的运动。萧军呢，也够固执的，不但一个字不检查，反而坚决抵制这一场声势浩大的批判。那时候，毕竟是胜利的前夜，人们以炽烈的激情迎接新社会的来临。欢庆的歌声、锣鼓声、鞭炮声，很快淹没了那场不愉快的批判，人们不再关心什么萧军及其《文化报》了。萧军虽然带着一颗伤痕累累的心灵，孤独地在南行列车中忧郁地注视窗外白雪皑皑的大地。大军南下，红旗直指江南，胜利了！但萧军本人却从一直为之奋斗的革命事业中抛出来。他当时的悲愤和痛苦是难以言说的。从此，萧军从文坛消失了。

今天，我们面向光明的未来，全力以赴夺取失去的时间，在从事四个现代化的建设的同时，总结历史教训，重新回顾和评价“文化报事件”，对社会主义文化的健康发展，对精神文明建设的实现，应该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

生活的辩证法是人的聪明才智所无法预料的。1946年秋天，当萧军从延安长途跋涉重返光复后的哈尔滨时，他怎么也不会料到，这个曾是他步入文坛起点的城市，几乎成了他断送政治生命和结束文学生涯的终结处。他那时是多么激动，欣喜，曾赋诗云：“金风急故垒，游子赋还乡；景物依稀是，亲朋半死亡，白云红叶暮，秋水远山苍；十二年如昨，杯酒热衷肠”。他在东北局彭真等党的领导同志的关怀和鼓励下，一头扑入工作，在哈尔滨各学校、机关和团体做过五十多天的巡回讲演，有时一天讲三场，每场人数多达一、二千人。宣传马列主义和党的政策，解答群众提出的各式各样的问题，对提高群众觉悟，肃清日本帝国主义奴化教育的反动影响，发挥了很好的作用。为了同样目的，东北局资助萧军办起了“鲁迅文化出版社”和《文化报》。《文化报》创刊于1947年5月4日，1948年11月2日被迫终刊。出正刊七十二期，增刊八期，共计八十期。在当时东北解放区产生了极为广泛的政治影响。

那时候，萧军实在走红。《八月的乡村》的作者、鲁迅的学生、延安来的革命老干部等头衔和身份，对东北人民群众、特别是知识分子，具有强烈的吸引力。天真质直、自信又多少有些傲气的萧军，便不顾一切地狂热工作起来，全然没有体察身边环境的复杂性。好心的朋友们开始提醒他，警告他，要他赶紧收敛，否则后果不堪设想。萧军却哈哈大笑，认为自己是全心全意为党工作，压根不存在什么“争夺”群众的问题。然而，事实很快证实朋友们的担心并非杞忧。这一年夏天，又一份报纸在哈尔滨创刊了，名叫《生活报》，由当时东北局秘书长刘芝明领导，宋之的主编。《生活报》无论在政治、经济以及发行等方面，都远远超过《文化报》，而且遍邀哈尔滨文化界人士时，唯独把《文化报》主编萧军排除在外。尤可骇怪

的是《生活报》在创刊号第一版的版心，用醒目的黑色边框圈着一篇题名《今古王通》的文章，大骂隋末的一个知识分子王通，说他封自己作孔子，“沽名钓誉”，“少不了有一些群众要被迷惑的。这种借他人名望以帮衬自己，以吓唬读者的事，可见是古已有之了。不晓得今之王通，是不是古之王通的徒弟”。只要不是傻子，都明白《生活报》锋芒所向，都清楚“今之王通”指的是谁。《生活报》的编者当然明白，以萧军暴烈、刚直的性格，是不会忍受这种指桑骂槐式的挑衅，必然应战。他们实际是把《今古王通》一文当作西班牙斗牛士手中的红布。萧军果然回击了！写了一篇《风风雨雨话王通》给以揭露和驳斥。这件事过后，双方经有关同志调解，曾暂时缓和了冲突。但这正如萧军三十二年后回顾往事时说的，“这可能是大雷雨前暂时的沉寂吧？”

不久，冲突以更猛烈的态势爆发了。

1948年8月26日，《生活报》抓住《文化报》为纪念抗战胜利而发表的社评中的一句话，大作文章，刊出《斥〈文化报〉的谬论》的社论，指责萧军和国民党反动派一样，“诬蔑苏联是赤色帝国主义”。接着连篇累牍地发表围攻萧军和《文化报》的文章，对萧军的思想、言行、创作，进行了多方面的毁灭性的所谓“批判”。萧军被判定为攻击苏联，挑拨中苏友谊，诽谤人民政府，诬蔑土地改革，反对人民解放战争。尽管萧军及替萧军鸣不平的同志写系列文章答辩，但终究无济于事。因为对方凭借强大的政治力量、组织手段和经济措施，以绝对优势，压垮了萧军及其《文化报》。最后公布了《中共中央东北局关于萧军问题的决定》、《东北文艺协会关于萧军及其〈文化报〉所犯错误的结论》。当时东北局宣传部的负责人刘芝明同志，也亲自写了长达万言的批判文章《关于萧军及其

〈文化报〉所犯错误的批评》，以党的领导人和理论家的姿态，实际上宣布萧军的政治生命和文艺生活结束了。从此以后，萧军便被钉在反苏、反共、反人民的耻辱柱上，各种文章和文学史教材，凡提到萧军时都口诛笔伐。1958年“反右”斗争后，《文艺报》搞了一场“再批评”，又把萧军同丁玲、艾青、罗烽、王实味、胡风等捆在一起，重新鞭挞一番。有人无中生有地说萧军在延安就受到批判，但他“把牙齿咬紧一点，‘忍耐地走下去’……忍耐着走呀，走呀，1946年9月他走到了哈尔滨。人民又向他伸出了热情的手。也许这时他认为条件已经变为对他有利了吧，于是，这头老狼马上又张牙舞爪，乱咬乱扑起来”。这位作者不愧是出色的童话家，他给人们讲了一个大灰狼的故事；也有人把笔锋对准萧军被批判后于艰苦中写出的新作《五月的矿山》，说这书宣扬了“腐臭的‘布尔巴精神’”，“是对工人阶级品质的‘恶毒地歪曲’……”。当然，所以要对萧军来个“再批判”，根本原因是萧军在群众中还有影响。据批判者说，“萧军还厚着脸皮对人说：他是作家，是打不倒的。”“当胡风黑帮窥伺好时机，抛出他的30万言的所谓意见书，对党的文艺思想展开进攻的时候。萧军又跃跃欲试地参与其事；当满天乌云翻滚，党内的反党分子配合资产阶级右派向党的领导大举猛扑的时候，也还有不少人瞩目于萧军，争取同他联合。”（以上引文均见1958年第七期《文艺报》上所刊载的两篇文章）噢，原来钉在耻辱柱上的萧军还有活气，还在动弹。那当然就得再钉上几根钉子，把他钉牢，钉死！果然，从那以后萧军再也不能公开发表文字了。萧军在了解真情的群众的心目中，终于成了穷凶极恶、面目狰狞的反动分子。直到粉碎“四人帮”很久之后，不少文章和书籍仍然如此看待萧军。呜呼，三人市虎，众口铍金，真是令人不寒